通电、报刊与政争：宁粤和谈中的舆论运用*

徐　进

摘　要：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双方由武力对峙转向和谈，但舆论较量却愈演愈烈。粤方暗中向报刊披露蒋介石下野的通电稿，以新闻自由旗号拓展政治宣传渠道，意在利用舆论压力迫使蒋介石下野。蒋介石却因宣传手段与策略的失误而屡屡陷入被动。国难当头，宁粤双方在报刊上极力塑造己方委曲求全的形象，并将破坏和平之责归咎于对方，博取舆论同情，并以此为己方行为的正当性辩护。宁粤之间激烈的舆论战加剧了彼此间的不信任，成为和谈的阻碍，更是将国民党各派系争权夺利的内情公之于众。

关键词：通电；报刊；宁粤和谈；舆论

DOI：10. 11714/jsysu. sse. 202601011

纵观整个民国历史，武力一向被视作决定政治力量盛衰成败的主导性因素。但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武力运用不具备正当性，舆论竞争的作用随之凸显。1931年2月，蒋介石扣押胡汉民于汤山，5月广州“非常会议”成立，形成宁粤对峙局面。九一八事变使宁粤双方皆失去使用武力的正当理由，于是和谈开始，双方的较量从战场转移到舆论场上。

新闻史学研究者从传播学的视角，探讨国民党政权对社会舆论的管控，以及社会舆论的反应如何影响了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①。但是，深描政治力量之间舆论竞争的历史细节，并在此基础上考察舆论的生成过程与传播机制，更有助于呈现民国时期政治与舆论的复杂关系。既有研究已经开始关注舆论因素在政治较量中的作用，并揭示了政治力量策动报刊舆论的后台过程②。此外，电报自晚清传入中国后，迅速成为政治势力策动舆论的重要渠道，由此产生“通电战”这一独特政治现象。对此，既有研究主要叙述通电内容及其引发的争论，尚未对通电的生成过程和背后的政治角力进行深入阐发③。

既有研究从派系政治、权力斗争的角度，对宁粤对峙与和谈的历史进行了细致勾勒④。本文则以1931年宁粤和谈为中心，结合民初以来形成的舆论与武力消长之传统，分析通电、报刊舆论的后台运作，以期进一步理解民国时期的政治文化。

* **收稿日期**：2025—01—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猜嫌、舆论与谣言：政治心理与民国政局”（24FZSB075）

作者简介：徐　进，深圳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深圳 518107）。

① 向芬：《国民党新闻传播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张举玺、祁涛、许俊峰：《南京国民政府新闻检查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刘继忠：《国民党新闻事业研究（1927—1937）》，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9年。

② 冯筱才：《沪案交涉、五卅运动与一九二五年的执政府》，《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陈以爱：《五四运动初期江苏省教育会的南北策略》，《国史馆馆刊》第43期，2015年3月。

③ 陈进金：《地方实力派与中原大战》，台北：“国史馆”，2002年，第20—55页。

④ 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修订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一、通电与政治:宁粤和平通电之争

北伐结束后,国民党内部各派系迅速分裂,酿成新军阀混战的局面。1929—1930年间,蒋桂、粤桂、蒋冯、蒋唐战争接踵而起,中原大战演至混战顶峰。大战结束后和平甫定,但蒋介石扣押胡汉民却导致宁粤对立,双方剑拔弩张,战事一触即发。

由于国民党新军阀之间连年混战,此时全国上下厌战情绪日盛。蒋介石的盟兄黄郛指出:“去冬对西北战终了,人以为必可有一、二年之小康,不料不及数月而粤事、而匪患、而石变相继而起,故此次军事之后,人民已不如去年之兴高望殷。”[①]《大公报》社论呼吁国民党各派公开政争,消弭兵争[②]。《益世报》社论批评国民党“以武力为解决政争之方法”,指出“政治基础,建筑于军事之上,仅能收一时之微效,不易求澈底之安宁”[③]。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救亡重于内争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即便是在反蒋氛围最浓厚的粤方大本营广州,“每次群众大会中高呼打倒日本口号则掌声雷动,至呼促蒋下野口号则应者寥寥”[④]。在此背景下,宁粤双方通电宣布中止军争,共御外侮,转向借重舆论为自身政治诉求寻求道义支持。粤方坚持蒋介石下野方可息争,但考虑到蒋介石此前扣留李济深、胡汉民等违反政治道德之举,故要求蒋必须发表下野通电。作为交换,粤方亦同时通电取消广州政府[⑤]。

民国时期,政治领袖主动发表通电公开某项承诺,则意味着接受社会舆论监督,其遵守与否关乎政治信誉乃至统治正当性。蒋介石对此极为谨慎,始终避免向粤方做出可资宣传的实质性承诺。此前蒋曾撰写致粤方亲笔信,表示只要粤方取消政府,自己朝夕即可下野[⑥]。但蒋很快就意识到此信一旦发出,将授粤方以口实,故再三考虑后中止发出[⑦]。此时蒋仅通过陈铭枢等人向粤方口头传达了“下野毫无问题”的承诺,而落实到纸面信件上,则只承认政治过失,毫不提及下野[⑧]。面对粤方的通电诉求,蒋介石以外交紧急,不可使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为由,坚决予以回绝[⑨]。

粤方见蒋始终不愿主动做出下野承诺,故将此前拟就的双方通电稿公诸报刊,以舆论监督和政治信誉逼蒋就范。粤方以“广州通讯”的形式,将双方通电稿秘密发送给《大公报》在内的北方报纸[⑩]。选择北方区域亦有挑拨蒋、张关系的考量,事发后,蒋曾责问张学良令其“查究”[⑪]。16日,北平《世界日报》首先公布两则通电,但为避嫌而谎称此电由南京公布[⑫]。一时间全国报纸相继转载,蒋介石下野之说不胫而走。同日,桂系机关报《南宁民国日报》则毫无顾虑地明言消息源是“广州讯”,并公开指责“蒋中途变化致原案不能如期实现”[⑬]。不过鉴于其影响力较弱,关注度远不及商业报刊。

---

① 任育德编:《黄郛日记》(1931—1932),香港:开源书局,2019年,第71页。

② 《不可有兵争,不可无政争》,《大公报》1931年5月3日,第2版。

③ 《解决政争不在军事》,《益世报》1931年5月22日,第2版。

④ 《蔡劲军致蒋中正真电》(1931年10月11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90200—00004—117。

⑤ 《蔡元培张继陈铭枢致蒋中正艳电》(1931年9月29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90200—00003—116。

⑥ 《蒋主席致汪兆铭孙科古应芬等书》(1931年8月4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20200—00010—050。

⑦ 《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6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下文引用《蒋介石日记》皆出自此处,不再一一注明。

⑧ 《反蒋运动史》,中国青年军人社印行,1934年,第457—458页。

⑨ 《蒋中正致陈铭枢歌午电》(1931年10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20200—00014—006。

⑩ 《所谓和平通电,中央并无所闻》,《大公报》1931年10月21日,第3版。

⑪ 《蒋中正致张学良哿电》(1931年10月20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10200—00061—067。

⑫ 《全国一致对外,和平两要电昨晚发表》,《世界日报》1931年10月16日,第3版。

⑬ 《完成和平统一之粤蒋两方通电草案》,《南宁民国日报》1931年10月16日,第1版。

粤方对报刊的利用,亦受到报刊自身运营、竞争因素的影响。《大公报》并未选择立即公布这一新闻,而是于《世界日报》发布通电的次日,公开辟谣:和平通电并未发出,两则通电仅是草稿性质,蒋方误以为是和会条件,而粤方以为是进行程序,但均已是过去之事[①]。尽管《大公报》与蒋关系匪浅,但蒋介石迟至20日才命中央社出面澄清,故其行为不可能是蒋授意。鉴于《大公报》是《世界日报》的商业劲敌,其行为从新闻竞争的层面不难理解。民国时期,报刊间新闻竞争的核心标准是消息是否翔实、判断是否准确,即时效性与准确性[②]。《世界日报》的竞争策略是发挥时效性优势。它利用《大公报》下午才能到北京的缺点,提早出报时间,使其在北平的发行量始终在《大公报》之上[③]。而《大公报》则更注重新闻准确性,依靠其与高层政要的密切关系,获取更多政治内幕[④]。此次《大公报》依据粤方情报,判断和平通电并未发出,不久后得到应验,向读者证明其真实性更胜一筹。《大公报》此举虽出于商业竞争,但客观上削弱了粤方散布蒋下野通电造成的舆论影响。

蒋介石下野牵涉政治全局,而事先知情者极少,故通电一经公布立即引起政局震荡。各方势力窥测政治风向,筹备联名通电作为回应。湖北省主席何成濬计划联络川、湘、皖、豫、赣各省军人,发出联名通电,公推何应钦领衔,警告粤方"不得取对等和议,推翻现制,破坏约法,更易元首,动摇大局"[⑤]。同一时期,华北将领亦计划发联名通电,主张"互相团结,和平统一,一致对外,拥护元首、共赴国难"。耐人寻味的是,两方通电并未径直发出,而是先行向报界披露[⑥]。

何成濬组织拥蒋通电,彼时尚不清楚蒋介石是否有意下野,故其行为应属自发,蒋介石事先未有预闻。10月21日,安徽省主席陈调元致电何成濬,提议通电拥蒋,何与之一拍即合,当即展开联络。23日,何成濬将陈调元电分别转达四川省主席刘湘、陕西省主席杨虎城以及贵州省主席毛光翔,请其列名。但直至此时,何、陈尚不清楚蒋介石是否下野。24、26日,何、陈二人分别私下致电蒋介石,询问其是否下野,并表示劝进之意[⑦]。如蒋介石事先授意何、陈等将领通电拥护,则其不下野的态度已然明了,二人无必要去电问询。

此外,24日,何成濬还私下发给蒋一份湖北将领联名拥戴电,表示"如有不顾正义违背公理者,誓当仰承钧旨,努力剪除,以固国本而安大局"[⑧]。何此举旨在揣度蒋意,如蒋希望将领通电劝进,则可公布此电。但蒋始终未曾公布。

何成濬拥蒋动机不难理解。湖北是南北交通要冲,为粤方必争之地,蒋下野后何成濬地位岌岌可危,故极力拥蒋[⑨]。此外,何成濬积极联络其他地方实力派,亦在为蒋下野后的权力格局做准备。1932年1月,何成濬发起"豫、陕、甘、苏、皖、湘、鄂、赣"八省联防,欲借此另造势力与粤方分庭抗礼[⑩]。后来因蒋介石及时阻止,以及孙科政府迅速垮台,蒋、汪合作入主中央,其事遂寝。

通电列名亦是权力关系的体现,华北将领通电背后涉及东北军与晋系的权力角逐。中原大战后,东

① 《和平电并未发》,《大公报》1931年10月17日,第3版。

② 徐铸成:《旧闻杂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93页。

③ 张友鸾等合著:《世界日报兴衰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82年,第71页。

④ 例如1930年3月《大公报》得知阎锡山放冯玉祥返回潼关消息,以"录此存照"的方式预先通知读者。详情参看徐铸成:《旧闻杂忆》,第15—19页。

⑤ 《何成濬致张群宥申电》(1931年10月26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116—010103—0138—010。

⑥ 《国内要电二:促进和平运动》,《申报》1931年10月27日,第6版。

⑦ 《何成濬致蒋中正电》(1931年10月24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90200—00004—124;《陈调元致蒋中正电》(1931年10月26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90200—00004—127。

⑧ 《湖北将领致蒋中正电》(1931年10月24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90300—00041—039。

⑨ 《胡燮槐致何键东辰电》(1932年1月1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116—010108—0187—091。

⑩ 《蒋中正复何成濬电》(1932年1月7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80200—00050—006。

北军成为华北的掌控者,其权势体现在列名通电上。1931年7月,原西北军将领石友三反对东北军张学良。东北军二号人物、张作霖的把兄弟张作相率领华北75名将领发表联名讨石通电,向外界宣示华北尽在其掌控之中[①]。然而,由于阎锡山秘密返晋和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军对华北的控制受到挑战。10月18日,阎锡山向粤方承诺,愿率晋系将领通电响应粤方主张[②]。为了争夺华北主导权,张作相此时发出拥蒋促和通电,并要求晋系将领列名,以示山西尚未脱离东北军掌控[③]。

公布军人拥戴通电可以自壮声势,但也潜藏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民初以来,将领通电素有军人干政之嫌,易于遭受社会舆论谴责。如1918年8月,吴佩孚发表"马电",反对段祺瑞武力统一,主张南北议和,段祺瑞即指责吴以师长身份通电干政[④]。而吴亦无法否认,只得反唇相讥,称其行为是师法段祺瑞在孝感通电共和[⑤]。正因军人干政这一原罪的存在,军人通电在舆论上动辄得咎。吴佩孚深得舆论支持,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塑造的纯粹军人形象,但稍有不慎过问政治,亦会失去支持。1928年,吴在致各省通电中提及"巩固北洋正统"一语,因触犯军人干政之嫌而招致舆论反对[⑥]。

因此,对于蒋介石而言,军人拥戴通电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公布通电可以自壮声势,向粤方施压;但另一方面,也易于引起军人干政之嫌,反而招致全国舆论反对。蒋对其中利害心知肚明,最终决定出面否认将领的拥戴行为。27日,他针对近来传闻,向报界公开表示"军人应听党国决定,不宜有所主张"[⑦]。次日,何应钦、邵力子、张群等亦遵从蒋意,去电何成濬予以阻止[⑧]。

但问题是民国政治场域舆论的后台运作已成常态,政治人物的公开表态往往被怀疑与真实意图截然相反。孟森就注意到舆论的"反运动"倾向:全国舆论倾向联省自治而反对中央集权之时,"其巧妙者乃极端分权,主张每县制宪,以剥夺省之集中,从此立论,理直气壮",此种无稽之说既可反对自治,而"官僚军阀又得掩其贿托之迹"[⑨]。在这一语境下,蒋介石的表态亦难逃"瓜田李下"之疑。且不论蒋介石是否有意就此玩弄伎俩,在时人眼中,此事已成为蒋自导自演的双簧戏。据时在上海的周志远观察,蒋无非是授意"何成濬陈调元辈以督军团式之电稿誊诸报纸,推诿为不知,佯言禁止。其欺骗可知",他还认为此事"在蒋氏或自鸣得意,但舆论已不直其所为。粤方正大主张得以公开发表,则在舆论上亦可谓成功也"[⑩]。

无独有偶,前文述及《大公报》曾辟谣宁粤"和平通电并未发出",同样被怀疑是蒋暗中授意。鉴于《大公报》主编张季鸾与蒋介石关系密切,阎锡山幕僚贾景德认为《大公报》是"蒋的机关报",判断其说辞不过是替蒋辩解,起初并不相信此电未发,直到山西省政府迟迟未接到电文,方知《大公报》所言不虚[⑪]。报刊新闻的真真假假,实为近代中国政治史一大景观。蒋介石下野电的公布便是其中一例。

宁粤对峙期间,粤方因武力上的劣势,难以实现逼蒋下野的夙愿。即便是双方于广州会商时曾拟定

① 《华北七十六将领昨日通电讨石友三》,《益世报》1931年7月24日,第2版。

② 《复广州潘宜之先生壬密巧电》(1931年10月18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116—010101—0100—023。

③ 《华觉明致何成濬感电》(1931年10月27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116—010103—0138—013。

④ 《段祺瑞复吴佩孚敬电》(1918年8月24日),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第3卷,武汉:武汉出版社,1989年,第505—506页。

⑤ 《吴佩孚宥电》(1918年8月26日),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第3卷,第508页。

⑥ 《吴佩孚之言动》(1922年5月30日),《沈钧儒文集》,北京:群言出版社,2014年,第79—80页。

⑦ 《蒋不赞成各将领发通电》,《申报》1931年10月28日,第8版。

⑧ 《何成濬致刘湘勘未电》(1931年10月28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116—010103—0138—025。

⑨ 《因反运动之流行当熟察激烈之正论》(1923年12月6日),孙家红编:《孟森政论文集刊》中,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854页。

⑩ 《上海周志远致天津舒卅电》(1931年10月30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116—010107—0162—057

⑪ 《贾景德致阎锡山效电》(1931年10月19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116—010108—0734—011。

下野通电稿,但蒋的强势否决亦令其无可奈何。为扭转双方权势的不平等,粤方积极策动舆论,暗中将双方通电稿向报刊披露,使蒋下野的承诺公之于众。此举迅速引发连锁反应,地方实力派出于维持自身权势的目的,以拥蒋名义组织联名通电,但其行为因触犯"武人干政"之嫌,反而使蒋在舆论上更加被动。但这只是宁粤和谈中双方舆论战的前奏,此后双方的较量愈演愈烈。

二、新闻封锁与宣传策略

北伐胜利后国民党内各派势力竞争激烈,政治上的多方竞争催生了舆论上的激烈较量。各方政治力量争相在北平、上海等全国舆论中心城市创办报刊。如阎锡山控制北平时曾创办《民言报》《新晨报》《北平日报》①,改组派在上海租界内先后创办《中央晚报》《国民日报》《华东日报》《上海民报》,作为宣传喉舌②。

各方政治力量皆希望封锁对手的宣传渠道,使其"噤声",其中的代表措施便是查禁报刊。1929年11月,阎锡山联蒋讨冯,一度取缔平、津之冯方报馆③;及至次年3月联冯反蒋,又转而取缔蒋方报馆④。各方之间的舆论竞争令商业报刊亦感到生存困难:国民党各方力量对商业报刊的报道十分敏感,一遇到于己方不利的报道,辄认为受对手方运动,于是报刊常常面临"甲地欢迎,乙地反对,甲地发行,乙地便禁止"的局面⑤。

不过,被封锁的一方亦希望突破限制,两者的较量是舆论竞争的常态。举例言之,1929年5月,蒋方何成濬向报界散布冯玉祥联俄之新闻,同时严禁北平报纸登载冯方消息⑥。一时间,冯玉祥联俄新闻铺天盖地,而冯则无处辩解。为打破蒋方舆论封锁,冯玉祥于太原设立无线电台向上海报界发布消息⑦。

为了应对与各方力量的舆论竞争,南京政府逐步建立起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其中邮电检查对敌对势力宣传的打击最大。1929—1931年间,《新闻法》《出版法实施细则》《全国重要都市邮件检查办法》《各县市邮电检查办法》等法案相继出台⑧。鉴于邮政和电报是报刊流通、新闻传递的主要渠道,邮电检查可以有效封锁敌对势力的宣传。1931年4月,仅南京一地的邮政检查所就查扣180种"反动刊物"⑨。不止于此,南京政府还可凭借邮电检查钳制外文报刊与通讯社。1931年4月,日本联合社发表对宁方不利的稿件,交通部下令所属电报、无线电台、长途电话、邮政各局,凡遇该社新闻稿件,一律严予扣留⑩。

1931年宁粤对峙初期,上述新闻管控机制使粤方宣传难以突破广东区域。例如粤方政治机关报

① 徐士瑚:《九十自述》,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山西文史资料》第120辑,太原:《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年,第54页;华觉明:《解放前北京的著名记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文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229页。

② 白衣、天人:《从中央晚报说到上海民报——改组派在上海宣传历史之一页》:《当代史剩》,上海:上海周报社,1933年,第217—266页。

③ 《何成濬致方本仁马秘电》(1929年11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116—010103—0024—077。

④ 《太原王毓秀胡捷三致归德孙殿英漾电》(1930年3月23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116—010107—0042—067。

⑤ 胡政之:《中国为什么没有舆论》,《国闻周刊》第11卷第2期,1934年1月1日,第1—5页。

⑥ 《何成濬致陈立夫皓电》(1929年5月19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90400—00006—292。

⑦ 《蒋中正致何成濬方本仁删未电》(1929年10月15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116—010103—0014—135。

⑧ 黄瑚:《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7—168页。

⑨ 《南京通讯——关于邮电检查》(1931年7月8日),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特委县委文件》(1925年2月—1934年7月),内部发行,1987年,第296页。

⑩ 《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公函》(1931年4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1—014130—00003—022。

《广州民国日报》一进入四川,旋即被宁方控制下的邮政检查机关扣押[①]。为突破宁方新闻封锁,粤方一度在天津、上海等地创办宣传刊物,但收效甚微。改组派创办于天津的《人民行动日报》,因"纯载粤方消息",存在不到一月即被封禁[②]。7月,改组派在上海租界内创办的反蒋报纸《上海民报》亦被上海市政府以"谩骂中央,侮辱总座"为由,函请租界当局查禁,不久即被"封报拿人"[③]。

宁方亦凭借其权势强化对国内主流报纸的控制,严禁刊登粤方新闻。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分别于10月1日和9日召开新闻招待会,与会者覆盖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各地主要报馆。国民政府中宣部副部长陈布雷严禁各报发表于政府不利的言论,并特意强调"此时各种别有用心之分子,皆以幸灾乐祸之心理,进行其破坏挑动之工作",此说虽泛,当揆诸时事,显然是针对在舆论上与之积极竞争的粤方[④]。

因此和谈伊始,粤方的当务之急便是突破宁方的新闻封锁。粤方以"言论自由"向蒋施压使其口头允诺,进而将其承诺公诸舆论,成功摆脱新闻管制的羁绊。具体而言,10月22日蒋介石抵沪会见粤方代表,后者要求蒋立刻停止新闻检查,蒋口头上表示允诺。但其口头承诺仅是临场应付,直至12月蒋正式下野后,上海的新闻检查才因陈铭枢的提议而暂时取消[⑤]。然而,粤方抓住蒋的表态大做文章,在次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此消息,表示今后可以时常向报界发表新闻[⑥]。但粤方此举迫使宁方新闻检查投鼠忌器,此后粤方向报界发布新闻畅通无阻。

需要注意,这一时期言论自由往往成为一种政治宣传策略。粤方提倡言论自由更多出于宣传竞争的考量,胡汉民对新闻检查的态度即是明例。1930年11月胡汉民与蒋尚未决裂时,曾委婉地批评报界自由过多,并宣称新闻检查制度有其合理性[⑦]。而此时胡汉民的态度与此前判若两人。10月20日,胡汉民接受记者采访时,严厉指责新闻检查为言论自由之障碍[⑧]。胡此时极力批评新闻检查,主要为政治宣传争取空间。言论解禁后不久,胡就将本方宣传工作的重心从广东转移至全国舆论中心上海[⑨]。

粤方的宣传策略,还体现在对本方新闻发布权的垄断上。粤方抵沪后,立即制定了新闻发布的程序:宣传委员会主任钟天心定期接待记者,粤方代表的各项报告、讲话文稿,经粤方办事处修订后,再统一送往各报馆、通讯处发表[⑩]。粤方为保证各报口径一致,还强行规定各报只能发表粤方公布的新闻稿件,禁止发表记者私自采访的稿件,以致沪上各报沦为"广东来的留声机"[⑪]。

然而,粤方宣传策略亦有不当之处。上述严格的新闻发布程序违背报刊运营机制,故而粤方与报界的关系一度紧张。具体而言,粤方规定各报必须刊载代办处自送稿件,侵犯了记者的自由采访权,亦违背此前鼓吹的言论自由。加之,粤方送稿亦出现失误:原本约定晚上8时送达报馆,结果迟至11时才由

---

① 《行政院呈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密函第六二〇六号》,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1—014130—00004—019。

② 《天津人民行动日报发刊辞》,《民友》第1卷第8号,1931年5月25日;《人民行动日报,当局令饬查禁》,《大公报》1931年6月3日,第7版。

③ 《上海市政府训令第八九七七号》(1931年7月16日),《上海市政府公报》第97期,第11—12页;《陈铭枢致蒋中正皓巳电》(1931年11月20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1—014130—00009—019。

④ 《中宣部昨招待新闻界》,《中央日报》1931年10月2日,第1张第4版;《中宣部昨招待新闻界》,《中央日报》1931年10月10日,第1张第4版。

⑤ 《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公署公函》(1931年12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1—126170—00001—020。

⑥ 《粤和平代表汪精卫等重要报告》,《申报》1931年10月24日,第13版。

⑦ 胡汉民:《谈所谓"言论自由"》,《中央日报》1930年11月21日,第3版。

⑧ 《政治中心顿然移到上海》,《大公报》1931年10月21日,第3版。

⑨ 《胡汉民致陈肇琪函稿》(1931年12月18日)、《胡汉民致林焕庭电稿》(1931年12月29日),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7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20、469页。

⑩ 《粤代表注重宣传》,《时报》1931年10月23日,第6版。

⑪ 《各记者围攻粤方代表之一幕》,《新大陆报》1931年10月28日,第3版。

远东新闻社代为送达。而且稿件未加盖粤方办事处印章,无法证实其真实性。因此粤方宣传机关饱受报界诟病。

此外,粤方宣传机关对新闻记者态度轻慢,引起报界不满。尽管粤方在沧州饭店设立记者接待处,但负责人钟天心却很少到场。更有甚者,钟对记者态度傲慢,严厉拒绝记者采访粤方要人,且语出激烈。面对记者提出的违背言论自由的指责,钟竟怒斥道:"尔等亦知言论自由耶?"①

作为回应,报界依靠其控制的舆论权向粤方施压,迫使其做出让步。26日,各报记者围堵粤方办事处,要求改善记者招待制度、不得无端封锁新闻、撤换钟天心,如粤方拒绝上述条件,则各报将一致拒绝发表粤方任何新闻②。

不过粤方宣传策略的高明之处在于能够及时应变,主动营造与报界的良好关系。汪精卫向来对记者礼遇有加,报人徐铸成回忆道,他作为大公报记者采访汪精卫时,汪将其送至大门口,甚至亲自开启车门③。此次汪精卫对记者诉求欣然允诺,并主动表现出亲和力以拉近与记者的关系,不仅对记者有问必答,甚至亲自护送,鞠躬道别,对记者礼遇至极④。汪精卫拉拢作为"无冕之王"的记者,恰恰体现出其宣传策略的老练。此后粤方与报界的关系由紧张转为融洽。

相较之下,宁方宣传则混乱无序,甚至出现宁方代表否认己方中央社宣传的乌龙事件。10月28日,粤方于正式会议前提出《党政改革案》,宁方代表认为"关系重大,中央未之前闻,不便讨论",由吴铁城出面电蒋请示意见⑤。次日,蒋介石复以此提案违反党章,不应提出讨论⑥。同时,蒋授意中央社将粤方提案与复电公诸报刊,以示反对⑦。然而不知何故,此电未能及时送达宁方代表手中,以致31日蔡元培接见记者时,竟答以"余等并未接到此项电报,而此项消息,究属何人所发,亦不得而知,故尚须调查此项消息之来源"⑧。宁方代表怀疑中央社电文的真伪性,令宁方宣传十分难堪。

这一乌龙事件主要是蒋介石与宁方代表沟通不当所致。参与和谈的宁方代表程沧波曾提到,宁粤双方和谈代表的阵容和性质大相径庭:粤方代表阵容强大而实权在握;而宁方代表则多持"第三者的立场,态度超然"⑨。宁方代表并无实权,故遇事需请示于蒋。加之蒋介石为确保机密性,其复电不拍发给本方代表,而是先拍发给亲信张群,再由张亲自译文并转交给指定代表。前述蒋29日复吴铁城电即是一例。繁复的通讯流程埋下了前后方沟通不当的隐患。蒋介石得知蔡元培发言后甚为惊诧,当即电问李石曾、吴铁城二人,"岂公等未转示孑(蔡元培)、溥(张继)两公耶?"⑩但会议记录显示,31日当天讨论的《中央政治改革案》,正是此前粤方提出的《党政改革案》中涉及中央政府及国家元首的部分。此时吴铁城已代替李石曾出席会议,如接到蒋的指示,理应提出反对⑪。可见吴大概率未接到此电。此后蒋介

① 《汪精卫向新闻记者道歉记详》,《晶报》1931年10月30日,第2—3版。

② 《各记者围攻粤方代表之一幕》,《新大陆报》1931年10月28日,第3版;《沪新闻不满钟天心》,《中央日报》1931年10月27日,第1张第3版。

③ 徐铸成:《徐铸成回忆录》修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58页。

④ 《京粤代表招待记者之态度》,《福尔摩斯》1931年11月9日,第1版。

⑤ 《吴铁城致蒋介石勘电》(1931年10月28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90200—00003—030。

⑥ 《蒋介石致张群艳未电》(1931年10月29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90200—00003—136。

⑦ 《粤方所拟提党政改革案中央认违反党章不应讨论》,《中央日报》1931年10月31日,第3版。

⑧ 《和会精神仍属圆满》,《申报》1931年11月1日,第13版。

⑨ 程沧波:《宁粤和谈追随蔡先生的经过》,《传记文学》31卷第2期,1977年。

⑩ 《蒋介石致张群东戌电》(1931年11月1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90200—00004—232。

⑪ 《上海"和平统一"会议记录》(1931年10月27日—11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802—803页。

石为避免类似事件发生,两度召集宁方代表回南京面商[①]。这一事件暴露出宁方宣传的薄弱之处,为其舆论上处于下风做了注脚。

宁粤对峙之初,宁方凭借新闻管制措施,一度使粤方宣传难以开展。但随着和谈阶段到来,粤方凭借宣传策略突破了宁方的新闻封锁,逐渐在舆论竞争中占得先机。宁粤和谈期间,各报舆论倾向粤方,令蒋介石如芒在背。10月31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各报舆论皆为反动派所蒙蔽,是非不明,人心不定,此国家之所以乱也。"[②]

三、舆论竞争的升级及其恶果

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双方由对峙转向和解,但舆论场上的攻讦却未曾停歇一刻。宁方抓住粤方陈友仁联络日方一事大做文章。9月28日,上海市党部发表通电,谴责此前粤方派陈友仁访日出卖东北权益,"挟持中央,勾结外敌,断送国土"。10月5日,宁方中委张道藩在浙江省府、党部联合纪念周上痛斥陈友仁卖国[③]。粤方亦反唇相讥,指责蒋介石的失道行为。10月17日,胡汉民接受法文《上海日报》记者采访,指责南京政府军事独裁,政策不公开,财政不透明[④]。

宁粤双方本就相互猜疑,而旷日持久的舆论交锋更进一步加深了宁粤之间的不信任。和谈前夕,胡汉民阅报获悉宁方"所属党部多电斥议和,且云只有个人到京服务,此明受暗示。而京、沪间反日捕杀党人,指为通粤,则敌视之心未泯皆不能使人无疑",故而判断宁方缺少诚意,怀疑"他日少有龃龉,彼即诿过于我方也"[⑤]。党部的"电斥"公诸报端,胡汉民判断是来自高层暗示。实则地方党部往往言论激进,遇事生风,未必全是中央授意。但是一经报纸播布,有意无意间便放大了宁粤双方之间的隔阂。

宁粤双方对舆论竞争之弊并非无所察觉,一度有所收敛。粤方宣传委员刘芦隐曾致电宁方中宣部副部长程天放,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要着,必须求各方同志先除疑忌心理",而欲达此目的,"各处下级机关,凡足以引起同志间互相疑忌之举动,尤宜约束。希以此意转介(蒋介石)、季(汪精卫)两公及立夫(陈立夫)兄等"[⑥]。粤方代表来沪前,"沪公安局有人拟密使多人接船时质问粤方代表",陈铭枢深恐此举破坏和平,曾电请蒋介石加以约束,并严密保护粤方代表[⑦]。在蒋的干预之下,上海市当局一改往日敌视粤方的态度,"除派员欢迎外,并发通电,促开和平统一会议"[⑧]。

不过此种缓和措施远不足以弥合宁粤之间政治互信的缺失。由于双方对新闻舆论极其敏感,任何批评言论和不利报道都会被立刻视为对方的宣传手段。10月21日,粤方代表发表共同谈话,其中论及

---

① 《蒋介石致张群东午电》(1931年11月1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10200—00062—001;《蒋介石致张群支酉电》(1931年11月4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10200—00062—004。

② 《蒋介石日记》,1931年10月31日。

③ 《陈友仁秘密卖国》,《民国日报》1931年9月29日,第2张第3版;《陈友仁卖国》,《中央日报》1931年9月29日,第2张第1版;《张道藩报告中央对日方策》,《民国日报》1931年10月8日,第2张第2版。

④ Hu Han-Min Speaks out in an Interview ,*The Shanghai Sunday Times*, Oct. 18, 1931, pp. 1-2.

⑤ 《胡汉民致古湘(芹)翁电稿》(1931年10月16日),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3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24页。

⑥ 《刘芦隐致程天放电》,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7册,第457页。

⑦ 《陈铭枢致蒋介石巧申电》(1931年10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786页。

⑧ 《蒋介石复陈铭枢电》(1931年10月1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786页;《党部欢迎》,《申报》1931年10月22日,第14版。

“打倒个人独裁”“不能单纯依靠武力争胜”[①]。蒋介石阅后,当即判断粤方“诋毁讥刺未改旧态,为之骇异”[②]。在不信任的氛围下,会场外的舆论竞争非但未停止,反而持续升温。

此时全国民望倾向于宁粤止戈,共赴国难,故宁粤双方争相塑造己方求和平的政治形象,并将破坏和议罪名诿过于对方。10月27日第一次会议上,由粤方汪精卫报告双方自9月以来的交涉过程,表决通过后做成记录,向报界公布。然而,该报告明显偏向粤方,因其有意识地省略了此前广州会商时,粤方坚持蒋必须发通电下野,险些使和会破裂一事[③]。粤方此举旨在营造其呼吁和平、国难为先的舆论形象。

宁方迅速识破这一意图,并进行回击。蒋介石阅报后,立即致电宁方代表蔡元培等人,斥责粤方此举是有意“捏造是非,绝非精诚和平团结之意”,并反问“未知蔡先生有否将发表之件寓目”[④]。蒋此言或是委婉地批评蔡等人不够机警,未识破粤方的宣传伎俩。作为回应,蒋授意中央社发表新闻稿,指责粤方所发布会议经过“与事实颇有出入,且将来往原文,真意抹杀”,指责粤方“似用新闻政策,尚未开示诚意”[⑤]。

然而,毕竟汪精卫报告已经由会议表决通过,此时蒋介石矢口否认也于事无补。粤方依靠程序正当予以反击,于30日第四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以下决议:“本会议每次所发表之消息,均先经各代表同意,由当日会议之主席签名,交各新闻记者钞录,外传发表之会商经过情形与事实颇有出入,未免误会,应予声明。”[⑥]这一声明针对的正是中央社电文,从法理上否定了蒋在舆论上对粤方的控诉[⑦]。

有别于报刊媒体的公开透明,政治运作多在幕后进行。政界与公众之间的信息差为前者操纵舆论提供了行云布雨的空间。针对粤方隐瞒会商经过的举动,宁方有选择地公开双方交涉电文,美化自身形象的同时,使对方的谎言不攻自破。

具体言之,10月30日,宁方控制下的中央社公布《蒋主席致汪古孙等函》《张蔡陈等到港后来电》《蒋主席致蔡张陈电》三则函电,从内容上看,旨在向外界传达三层信息:蒋介石向粤方表示愿承担过去一切罪愆,足见其诚意;粤方一度以赴沪开会为条件,胁迫蒋发下野通电;蒋曾提出三种解决粤事办法,一粤方入京改组政府则蒋下野,二粤方全体加入宁方,三宁粤合作来沪谈判,如今采取第三种办法,不存在下野通电问题[⑧]。由此可见,宁方希望向舆论澄清双方谈判的真实过程,进而表明粤方曾要挟逼蒋下野,毫无和平诚意。

通过报刊互相揭发,其结果往往两伤。10月31日,粤方针锋相对地公开蒋介石10月5日给陈铭枢的电报,在这封电文中,蒋以“国不可一日无政府”为由拒绝发表下野通电,但向粤方承诺,“诸兄朝到沪,此电夕发”[⑨]。但如今粤方代表已然抵沪,而蒋仍未正式发出下野通电。故而该电一经公布,蒋介石自食其言的行为极易被解读为贪恋权位,毫无诚意,其政治形象自然大受损害。此番舆论较量固然粤方在声势上胜出,但却使和谈愈发陷入僵局,宁粤双方皆是输家。《大公报》在总结和会困难原因时提到,粤方频

① 《共同谈话》,《申报》1931年10月22日,第13版。相同内容参见《粤代表谈话》,《民国日报》1931年10月22日,第2张第3版;《种种表示》,《时报》1931年10月22日,第5—6版。除排版略有不同,上海各报所载谈话内容完全一致,当出自粤方统一发表的新闻稿。

② 《蒋介石日记》,1931年10月22日。

③ 《会议进行经过》,《申报》1931年10月28日,第13版。

④ 《蒋主席致张群勘午电》(1931年10月28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20200—00014—017。

⑤ 《京中对和平团结之观察》,《中央日报》1931年10月29日,第1张第4版。

⑥ 《上海“和平统一”会议记录》(1931年10月27日—11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801页。

⑦ 《反蒋运动史》,第480页。

⑧ 《磋商和平之经过》,《民国日报》1931年10月31日,第1张第3版。

⑨ 《粤方代表发表蒋电》,《大公报》1931年11月1日,第3版。

频在报上发表谈话,“京方感觉彼等利用新闻政策太过,因感情问题,使形势愈去愈远”①。

此时外报流出的一则新闻更加剧了宁粤之间的不信任,一度使和谈险些中断,个中缘由值得细致剖析。11月3日,《字林西报》报道称,蒋介石于前日召开的国府纪念周演讲中曾激烈指责粤方:无合作诚意,阻挠中日问题解决;胡汉民不仅要逼蒋下野,甚至要仿苏联托洛茨基旧事将其流放海外;粤方利用上海华文报纸反抗中央;粤方反抗中央助长了日本侵略。更重要的是,蒋还宣称自己绝不下野,“唯一的出路就是继续执政”②。此则报道决非凭空捏造,与会的邵元冲亦提到蒋因粤方提出条件过多,“颇致愤懑之辞”③。报道发布当日,宁方代表陈铭枢即分别拜访汪精卫、孙科,并致函胡汉民,说明蒋此番言论仅“系一时之意气,不足介意”④。不过粤方自然不愿放过这一借口,随即展开一轮新的舆论攻势。胡汉民发表谈话,痛斥蒋“以个人之私见,增加党内之分裂,致陷国家沦亡”,“固无面目见人民,亦无面目见总理于地下也”⑤。李宗仁亦斥责蒋拒绝下野是“欺骗无诚意”。更严重的是,粤当局据此判断蒋毫无诚意,致电汪精卫、胡汉民、孙科等人,“如和议无望即速回粤”,同时准备军事行动⑥。

考虑到此时全国民心倾向宁粤和谈成功,蒋介石此前亦积极营造自己委曲求全的形象,没有理由公开指责粤方而承担破坏和平的责任,故此番言论更多属于一时激切。实际上,蒋介石演讲时常有激切之语,几度引起风波。政学系的熊式辉曾向蒋提议演讲时语气不要过于坚决,以免失言⑦。为此,国民政府文官处曾令知各报馆,刊载国府纪念周演说词须以文官处修正后版本为准⑧。但即便如此亦难免疏漏。1931年1月,文官处修正后的演说词中曾提到欧洲随时可能爆发大战,此番言论随即引来英国驻华公使的非正式质问,为此蒋介石对文官长古应芬大加责备⑨。实际上,在张继等人的提醒下,蒋介石当即就意识到此番言论会有损己方形象,“遂令各报不要发表”⑩。殊不知此举反而促进了相关言论的传播。

宁方在中文报纸封锁消息的同时,外文报纸却因放宽管制而获得了更大的新闻自由权。南京政府成立后,新闻检查制度日益强化,在华外报亦受到禁止邮递、删改电稿等隐性管制措施的限制。然而,九一八事变后,为了争取国际舆论支持,蒋介石放宽了对在华外报的新闻审查。10月10日,蒋介石致电上海市长张群和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切嘱电报局检查员,凡外国新闻记者发电报一律照发,万勿迟延,尤其勿可删改为要。”⑪因此,此则涉及宁方负面形象的新闻通过外报渠道广为传播。

即便如此,如果中央社及时公布整理后的演讲稿,亦或允许各报纸删去敏感内容后进行报道,亦足以削弱外报之影响。问题在于,蒋介石一方面允许外报自由报道新闻,另一方面却严禁中文报登载任何相关内容,致使外报成为唯一信息源,反而扩大了该报道的影响力。事后,《上海报》从新闻从业者的视角出发,批评国民政府“不应不准记者发表速记文,如不准记者发表,而能将原文从速整理,华文报能早将正式演词发表,又何致西文报之造谣耶”⑫。“造谣”二字自是曲笔,由于新闻管制制度的区别对待,外文

① 《沪会困难原因》,《大公报》1931年11月1日,第3版。

② Peace Hopes Wrecked,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Nov. 11, 1931, p. 11.

③ 王仰清、许映湖整理:《邵元冲日记》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786页。

④ 《陈铭枢解释误会》,《申报》1931年11月4日,第9版。

⑤ 《胡汉民负责谈话》,《申报》1931年11月4日,第9版。

⑥ 《广州潘宜之本密支电》(1931年11月6日到),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116—010101—0100—079。

⑦ 《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香港:明镜出版社,2008年,第193—194页。

⑧ 《国府慎重刊载纪念周演词》,《金刚钻》1931年1月18日,第2版。

⑨ 罗家伦:《蒋胡底关系》,罗久芳、罗久蓉编辑校注:《罗家伦先生文存遗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2009年,第15页。

⑩ 《天津作转上海明野支电》(1931年11月4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116—010108—0182—043。

⑪ 《蒋介石致熊式辉灰亥电》(1931年10月10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10200—00061—064。

⑫ 《国府纪念周拒绝新闻记者参加》,《上海报》1931年11月20日,第2版。

报纸信息真实性实则往往更受信赖。

事发后,蒋介石苦心孤诣塑造的委曲求全形象大受损害,舆论上彻底陷入被动,被迫向粤方做出更大让步。此前蒋介石始终坚持在南京召开四全大会,但粤方坚持在南京、广州两地分别召开。11月6日,宁方代表蔡元培、张继、吴铁城、陈铭枢曾劝蒋:此时社会心理最恶和谈破裂,和谈破裂则是全党之罪,故此时不可再"以能归罪粤为得计"①。权衡利弊之下,蒋介石向粤方提案做出让步。其后蒋介石正式通电下野,虽出于种种现实考量,但未尝不是粤方一以贯之的舆论压力所致。

此次舆论竞争的被动局面,促使蒋反思自身舆论运用的不足。1932年其再次上台后,更加重视听取报界人士意见,并与著名报人建立私交。其与前《申报》主笔陈景韩的关系即是一例。蒋时常以要事询问陈,而陈亦予以蒋言论发表方面的建议②。其后著名报人陈布雷亦被任命为蒋的侍从室主任,替蒋撰写、整理演说文稿。

会场之外,宁粤双方揭底式的舆论较量,除了使本就貌合神离的和谈雪上加霜,更是将和平幌子下国民党各派系争权夺利的内情展露无遗,损害着国民党政权的政治形象。就在宁粤双方在会场内高呼共赴国难之际,在上海和广州却接连发生武力镇压民众反日游行的"闸北事件"和"永汉路惨案"。上海《新闻日报》社论批评宁粤政府实乃一丘之貉,并以戏谑的口吻说道:"本来救国大事,自有政府,何劳你们越俎代谋呵!"③沪上小报《克雷斯》社论评价宁粤和谈:"于是宁粤大斗法开始,于是乎宁粤团结无期,于是乎日军得以长据辽吉二省而惨戮我人民,于是乎空欢喜一场的人民还回复到怨声叹气!"④寓居香港的陈炯明曾致电和会宁方代表蔡元培、张继:"所谓统一,不过宁粤不分家;所谓和平,不过同党不相斫;所谓下野取消,亦不外双方领袖释拳握手,混合组府。一桶水倒来倒去,宁有泾渭清浊之分;几味药或减或加,无救庸医杀人之祸。"⑤宋庆龄更是公开痛斥宁粤双方争夺之焦点"乃为中委之分配与高位之人选,于全国最大多数之农工民众之疾苦利益,竟无一语之讨论",并振聋发聩地提出"党不能救国救民,自取覆亡,何所顾惜"⑥。

结 语

民国常常被视为一个"武人世界",武力不仅是"权力及其合法性的基础",更是"政治的出发点和最终依据"⑦。但在战场之外,舆论的作用亦不容忽视。一旦武力运用失去正当性,舆论便成为政争的重要手段。1931年的宁粤和谈正是如此,它为考察舆论在民国政争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绝佳案例。

李剑农曾总结道:北洋时期"约法无上",政争谈"法理",争"法统";改组后的国民党"党权无上",政争谈"党纪",争"党统"⑧。党统之争成为北伐后至全面抗战前"国民党内各次文争武斗的核心问题"⑨。但在有形的"法统"与"党统"之外,反映民心向背的舆论也是区分统治有道与无道的无形力量。民国时

① 《蔡元培张继陈铭枢吴铁城致蒋介石鱼电》(1931年11月6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90200—00003—036。

② 曹聚仁:《上海春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62页;《蒋介石日记》,1932年5月21日。

③ 《无独有偶的沪粤警察开枪》,《新闻日报》1931年10月15日,第1版。

④ 《宁粤大斗法》,《克雷斯》1931年10月30日,第2版。

⑤ 《致蔡元培张继书》(1931年10月10日),段云章、倪俊明主编:《陈炯明集》下,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52页。

⑥ 《宋庆龄之宣言》,《申报》1931年12月20日,第17版。

⑦ [美]齐锡生著,杨云若、萧延中译:《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5页;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93页。

⑧ 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上海太平洋书店,1931年,第531页。

⑨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修订版,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年,第95页。

期各种通电与时局宣言盛极一时,凡事皆须公诸舆论,成为一时奇景。正因如此,宁粤双方为争夺舆论上的道义支持展开激烈的竞争。

晚清以来,通讯技术的进步和报刊媒体的崛起既为舆论提供了载体,也为操纵舆论提供了便利。蒋介石以中央须有人负责为由推迟下野,粤方将此前拟定的蒋介石下野通电泄露给报界,使蒋陷入被动,并引发宁方内部动荡。宁方起初凭借新闻管制对粤方进行舆论封锁,但粤方利用宣传手段并取得沪上舆论的主导权。此后宁方虽尝试予以反制,但收效甚微,且因措施失当、配合失误而频频闹出"乌龙",最终未能扭转舆论的不利地位。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双方停止纷争、共赴国难已是民心所向,宁粤双方在报刊上不遗余力地塑造己方委曲求全的形象,并指责对方破坏和平。

不过,政治力量并不能任意操纵舆论,相反,其言行受到舆论的严格制约。宁粤和谈期间,地方实力派出于自身利益考量,主动发起联名通电拥蒋,触犯了民国以来武人干政的大忌,反而使蒋在舆论上陷入不利境地。此外,舆论的表达离不开报刊媒体,因此政治力量需要妥善处理与新闻界的关系,尊重新闻传播规律。粤方宣传机关侵犯新闻自由,违背报刊运营规律,一度与报界关系紧张。蒋介石一味追求封锁新闻,反而使过激言论由外报泄露而愈演愈烈,给予粤方口实。由此可见,政治力量与舆论是双向互动、相互塑造的关系。

缺乏政治互信是民国政治的一大痼疾,而舆论竞争加剧了政治力量之间的不信任,促使其采取更加激进的手段。因此,舆论竞争一旦开始便易于持续升级。宁粤双方会场外日渐激烈的舆论战,使会场内的气氛日益剑拔弩张,成为和谈的一大阻碍。此外,宁粤双方在舆论战中互相揭底的行为,将国民党各派系打着和平幌子争权夺利的内情公之于众,使民众对国民党政权的真实面目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Telegrams, the Press and Political Contestation: The Deployment of Public Opinion in the Nanjing-Guangdong Negotiations

Xu Jin

Abstract: After the Mukden Incident,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Nanjing Government and the Guangdong Government shifted from military tension to negotiations, but the battle for public opinion escalated sharply. The Guangdong Government covertly leaked to the press the draft telegram announcing the resignation of Chiang Kai-shek, using the banner of press freedom to expand its space for political messaging and to generate public pressure aimed at forcing him from office. However, Chiang Kai-shek repeatedly found himself on the defensive due to missteps in propaganda tactics and strategy. In this period of turbulence, both sides endeavored through the newspapers to portray themselves as conciliatory and willing to compromise, while assigning responsibility for undermining peace to the other in order to win public sympathy and legitimacy. This intense contest over public opinion not only deepened mutual distrust and impeded the peace negotiations, but also laid bare the factional power struggles within the Kuomintang.

Keywords: telegrams; the press; Nanjing-Guangdong Negotiations; public opinion

【责任编辑:赵洪艳;责任校对:赵洪艳,周吉梅】